



JPC

Journal of Publishing and Criticism

JPC, Vol. 1, No. 1, 2026, pp.53-64

Print ISSN: 3107-0892; Online ISSN: 3107-09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p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pc260106asmtm>



《大师与玛格丽特》中莫斯科文本的反乌托邦精神

吴佩莎 (Wu Peisha), 俞航 (Yu Hang)

摘要：莫基于“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的传统莫斯科文本内在地蕴含了乌托邦精神。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苏联政权的建立，乌托邦思想逐步转变为一种压抑个体自由与精神价值的官方意识形态。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折射出莫斯科文乌托邦精神的嬗变，以反乌托邦精神中的反思和批判意识观照社会，还原乌托邦精神的原初内涵。通过对莫斯科城市的重构，小说刻画了一个表面秩序井然、实则精神虚无的反乌托邦世界，又通过超越现实的“永恒的家园”揭示了莫斯科的救赎之路。布尔加科夫在解构官方乌托邦叙事的同时，延续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弥赛亚意识，其作品在深刻的批判性中寄托了对以爱、信仰与心灵自由为核心的精神家园的乌托邦式追寻。

关键词：《大师与玛格丽特》；莫斯科文本；反乌托邦

作者简介：吴佩莎，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电邮：1137912644@qq.com。俞航（通讯作者），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19世纪俄罗斯文学。电邮：yu8799@sina.com。

Title: The Anti-utopian Spirit of the Moscow Text in *The Master and Margarit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oscow, Third Rome” doctrine, the traditional Moscow text inherently embodies a utopian spiri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viet regim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ization, utopian thought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n official ideology that suppressed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piritual values. Bulgakov’s novel *The Master and Margarita* reflects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utopian spirit within the Moscow text, employing the reflective a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anti-utopian spirit to observe society and restore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s of the utopian ideal. Through his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of Moscow, the novel portrays an anti-utopian world that appears orderly on the surface but is spiritually hollow, while simultaneously revealing the path to Moscow's redemption through a transcendent "eternal home." In deconstructing the official utopian narrative, Bulgakov perpetuates the messianic consciousnes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His work, marked by profound critique, embodies a utopian quest for a spiritual homeland centered on love, faith, and inner freedom.

Keywords: *The Master and Margarita*; Moscow text; Anti-utopia

Author Biographies: **Wu Peisha**,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1137912644@qq.com. **Yu H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19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yu8799@sina.com.

引言

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历史悠久，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凝聚着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作为重要的文学母题，莫斯科书写传统贯穿于历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之中。作为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巨匠之一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1891-1940）生前最后一部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1967）以莫斯科为背景，承袭了自 16 世纪以来的“莫斯科文本”传统，吸纳了 20 世纪莫斯科文学中蕴含的反乌托邦思想脉络，展现出俄罗斯知识分子深植于历史传统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

《大师与玛格丽特》最初写成于 1928 年，布尔加科夫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直至他 1940 年去世，在他身后的二十多年，小说终于得以出版，成为了 20 世纪苏联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之一。《大师与玛格丽特》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苏联国内的关注，自此之后兴起了“布尔加科夫热”¹。我国对《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研究则起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主要集中在在人物形象分析、宗教神话研究、艺术风格分析和对比影响研究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开始有学者尝试从莫斯科文本的角度研究《大师与玛格丽特》。²既有研究在对《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分析中，突出了小说中具有莫斯科文本的共同之处——由小巷、墙壁和广场构成的城市迷宫，突显出了城市浪漫神秘的氛围，强调了莫斯科这座城市在新的神话背景下有了“苏联新神话”版本。以现有研究为基础，本文将引入历时性考察维度，考察莫斯科城市文本的神话构建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探析其中所承载的乌托邦精神的嬗变轨迹；并以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为核心文本，深入分析布尔加科夫是如何将作为乌托邦精神象征的莫斯科转变为反乌托邦精神的象征，同时在这种“反方案”的基础上反思现代性思想付诸实

¹参见梁坤：《布尔加科夫小说神话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绪论，第 1 页。

²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傅星寰：《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70-71 页。

践时产生的负面效果。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莫斯科不仅是情节展开的空间背景，更是作为一个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莫斯科文本”，承载着作者对权力、信仰与民族命运的深刻反思。莫斯科形象的嬗变不仅映照出历史与文化的演变轨迹，也体现了布尔加科夫试图通过小说重新凝聚与再造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努力。

一、莫斯科文本中乌托邦精神的嬗变

“莫斯科”（Москва）一词承载着除了城市实体之外深厚的文化内涵，它既是真实的地理空间，也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由此形成的“莫斯科文本”（Московский текст），已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概念。莫斯科从文学题材发展为系统性文本经历了漫长过程。20 世纪之前，莫斯科的形象已经频繁出现在诗歌、传奇与小说中，常被描绘为温暖抚慰的故乡；¹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文本正式诞生，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М.Цветаева）的组诗《莫斯科》（*Стихи о Москве*, 1916）、科尔日热诺夫斯基（С.Д.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的小说《邮戳：莫斯科》（*Штемпель: Москва*, 1925）及其他小说和安德烈·别雷（А.Белый）的系列长篇小说《莫斯科怪人》（*Московский чудак*, 1926）等一系列作品的出现为标志。以上作品系统性地将“莫斯科”作为核心母题和结构性元素进行书写，这使文学中的莫斯科形象和莫斯科题材逐渐走向成熟。这种创作的集中性和自觉性，标志着“莫斯科”已经从一个地理场景演变为一个独立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语义场所和诗学范式的城市文本。作为一个开放的符号系统，莫斯科文本被不断地书写和完善，从而成为了独具一格的文本机制。

莫斯科文本是独具俄罗斯特色的乌托邦精神的载体。莫斯科文本已经和民族精神融合，成为整个俄罗斯探索其命运、追寻人间真理的舞台。在源远流长的俄罗斯文学谱系中，莫斯科已经成为了承载了民族集体想象与精神寄托的核心意象，记录了人们对于信仰和真理艰难探索。“乌托邦”（utopia）一词形成源自西方哲学中的实体论，乌托邦精神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激励着人类不断前进。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文本中的乌托邦精神并非对西方乌托邦概念的简单移植，而始终根植于俄罗斯自身的历史哲学脉络。正如弥赛亚意识深植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结构之中，乌托邦冲动也持续贯穿并塑造着俄罗斯的文明进程与民族话语建构。乌托邦精神假定了在历史中人的命运终将达到最高完善的状态，它隐秘地存在着对历史结尾某种宗教上的指望，即对历史的悲剧终将结束的希望；而俄罗斯民族身上的正具有一种被称为“末世论”的追求，他们期盼着“一切有限的东西即将终结，最终的正义即将呈现。”（别尔嘉耶夫，2024，p.258）表现了俄罗斯人们的美好期望。对于俄罗斯的乌托邦精神来说，修士菲洛费（Филофей）关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历史哲学观念具有重大意义。16 世纪，东正教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菲洛费向莫斯科公国的大公进言，提出“莫斯科—第三罗马”（Москва-третий Рим）的理论，即“第三罗马”俄罗斯帝国将是神选的东正教世界中心和永恒的强大帝国，莫斯科所代表的俄罗斯国家是接替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来承担拯救世界任务的唯一最后继承人，负有在最终审判前守护真正信仰、对抗邪恶并迎接基督再临的终极责任。莫斯科作为最后的堡垒，在精神上与世界割裂，这种防御性的、自给自足的孤立状态，恰恰是催生内向的、

¹参见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和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等作品。

寻求内部温暖的家园感的历史心理前提。“第三罗马”理论为莫斯科作为心灵家园提供了历史深度、神圣合法性和情感上的不可或缺性。19 世纪，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和古都，其最初的文化形象与彼得堡的“西方”“理性”等概念相对立，常在作品中被描绘为“神圣罗斯”的心脏，代表了宗法制的、温暖的、带有民间烟火气的故乡。正如费多托夫（Федотов）所指出的，莫斯科始终“守护着乡土风情”（Федотов, 1992, p.56），是质朴真诚、人情味浓厚的心灵港湾。20 世纪，茨维塔耶娃的组诗《莫斯科》也将莫斯科作为祖国形象的代表，这使她散发着圣洁温暖的光辉。在俄罗斯境外侨民文学中，莫斯科成为了有关故乡和家的符号，是他们心中象征着美好生活与精神救赎的乌托邦。¹

然而，莫斯科文本体现了俄罗斯的乌托邦传统，也承载了乌托邦本身无法回避的悖论。一方面，俄罗斯民族非凡的性格就体现在“对痛苦的忍耐，对彼岸事物、终极事物的追求。”（别尔嘉耶夫，2024, p.17）这正是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弥赛亚主义”，他们等待着“上帝之国”的来临——它是“此世的终结，是非正义和丑陋的世界的终结，是新世界的开端，是正义和美的世界的开端”（同上, p.256）；另一方面，这种弥赛亚精神和乌托邦精神共同承载着一种内在的矛盾。正如别尔嘉耶夫在“凯撒王国”与“精神王国”的对比中谈论的，乌托邦作为一个理论上悬置的蓝图，在历史上曾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能够成为一种动力，吸引着人们不断靠近。别尔嘉耶夫写道：“乌托邦是人的本性所深刻固有的甚至是没有就不行的。被周围世界的恶所伤害的人有着想象、倡导社会生活的一种完善的和谐的制度的需要”，但作为在现实中生活着的人总是“以歪曲的形式实现自己的乌托邦”。（别尔嘉耶夫，2000, p.113）这些曲解的形式以未来蓝图的形式筑造了具有完善和谐制度的凯撒王国，却也由此形成了对自由的扼杀，因此别尔嘉耶夫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自由和自由的生活是最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同上, p.114）

历史上的乌托邦写作常把未来蓝图寄寓在现代性方案之中，其核心的思路是把人类幸福生活的愿望寄托在物质的丰富和社会制度的完善上。这些乌托邦思想家们构建社会理想时，普遍预设这个国度的人民应该生活在“合情合理的和谐和秩序井然的氛围中”。（赫茨勒，1990, p.124）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 1516）、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洋》到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城》等乌托邦写作都秉承着理性的原则，尝试以现代民主观念和现代科学技术打造理想社会组织，执着于各种政治、财产和婚姻等精细的制度安排，主张人类幸福的实现要依靠形式和法律的约束来实现。这些乌托邦模型和启蒙运动之中生成的现代性方案具有同构性，现代性方案作为思想模式倡导人们可以借助理性、科学和民主，实现生活的现代化，社会矛盾的化解和人的全面解放，但是它在运作过程中未能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因此，现代性方案随着 20 世纪社会的剧烈动荡而遭到普遍怀疑。“反乌托邦”（anti-utopia）文学由此诞生。

作为一种和乌托邦如影随形的讽刺批判手法，反乌托邦在思想上揭露了乌托邦蓝图在某些方面的不现实性和荒诞性，促使人们反思并改变现实。它与乌托邦精神同是出自于对现实的关切和对未来社会的希冀，但前者对那种试图以详尽“蓝图”来构建终极完美社会的乌托邦传统持深刻的批判

¹参见扎伊采夫《莫斯科》、什梅廖夫《朝圣》、布宁《纯净周一》和奥索尔金《希弗采夫·弗拉热克》等小说。

态度，并以“反方案”的形式延续着对未来的希望。¹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Zamyatin）的《我们》（*Мы*, 1924）、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1949）这三部作品系统性地构建了看似理性、实则极度压抑的未来社会模型，表达了对于未来社会恐怖图景的反叛。这些小说并非对人类的乌托邦精神理想的简单否定，而是以一种悖逆的方式展现作家们对当代社会科技与政治领域的深切反思。它们揭示了乌托邦蓝图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的矛盾，即“将传统乌托邦蓝图设计推向极端化而出现的完全有悖于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们初衷的反面状态。”（姜文振、黎新华，2020，p.35）因此，20 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性反思精神是反乌托邦小说的主要理论资源，其批判锋芒所向，是科学、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等现代性原则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后果，暴露了乌托邦的蓝图设计在现实中的片面性。然而，乌托邦精神作为对更好更完美的未来的期盼，它存在的本身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作家们以“反方案”的方式把乌托邦精神极力从蓝图派乌托邦手中拯救出来，使其回复到乌托邦精神本身。

反乌托邦精神与乌托邦精神之间的对抗就贯穿苏联文学的始终。正如学者董晓所言：“乌托邦性与反乌托邦性往往会同时并存，只不过前者是高度直觉的，而后者往往是不自觉的，是隐藏在前者之中的。”（董晓，2010，pp.32-33）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乌托邦精神在俄罗斯逐渐工具化，发展成了国家乌托邦主义，这种掺杂了意识形态话语的乌托邦精神使莫斯科文本中的莫斯科形象变得复杂且矛盾：它既是古老神圣的，又是具有现代性特征的都市。在革命精神感召下，古老的莫斯科形象被重新诠释。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共青团诗人等各阶层创作者都参与到这一文化构建中，塑造出崭新的“红色莫斯科”形象。苏尔科夫（А. А. Сурков）、江布尔（Д. Джембул）、马雅可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等作家都对莫斯科进行了真诚激情的讴歌与赞颂。“这些充满真诚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的作家大都体现了官方意志，这就使得他们无法超越当下的社会主流意识。”（同上，p.44）于是乎“这些作品大都忽略了对个人本真精神的描写，作品里缺少了人的心灵之声，作家对‘物’的追求远胜于对人的心灵之‘深’与‘复杂’的探寻。”（同上，p.57）本该属于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乌托邦精神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裹挟下，失去了对现实和主流官方话语的批判意义，成为政权意志的代言人。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觉察出莫斯科身上发生的变化，自他看来，最初“彼得堡代表着所有贯穿在俄罗斯人生活中的国外的世界性力量；莫斯科则昭示着所有本土沉积下来的、各种独有的俄罗斯民粹的传统……”（伯曼，2003，pp.225-226）然而，现代时期，本应作为反现代性、固守传统的精神堡垒的莫斯科，在被动应对现代化冲击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现代体验：城市规划者试图用宏大的蓝图设计实现社会平衡，但是却忽视了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也未能使人们的道德与精神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而增长。

俄国自 19 世纪以来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反乌托邦精神的作品，这并不意味着对未来的绝望，而是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对抗存在的虚无，顽强地坚守着人类的精神家园，保卫和延续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А.П.Платонов）、布尔加科夫等一批反乌托邦作家已经指出了这种乌

¹参见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彬译，新星出版社，2007 年，绪论，第 4 页。

托邦构想以宏大的终极目标为名，要求个体牺牲自由与尊严的弊端。布尔加科夫的巅峰之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展现出超越具体时代指涉的深远意义。作为一个生活在 20 世纪苏联的作家，二十年代末苏联的残酷现实粉碎了布尔加科夫的幻想。在越来越严苛的社会环境中，经历了作品遭到禁演的艰难困境，生活也难以维系的布尔加科夫仍然不愿放弃自己内心的追求，正如他在 1930 年 3 月 28 日致政府的信中宣称的那样：“无论审查制度如何，无论它存在于何种政权之下，与之抗争都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正如呼吁新闻自由一样。我热切崇尚这种自由，并认为，如果任何作家试图证明自己不需要这种自由，那他就像一条公开宣称不需要水的鱼……”¹作为一位热爱自由、追求真理、宣扬人道主义的作家，他本身即体现出了反乌托邦精神的核心内涵：保持一种反抗的或者批判的能量或精神，对于不理想的现实做出反应和反思。

在莫斯科生活期间，布尔加科夫见证了官僚主义膨胀、政治压迫与日常生活的荒诞化，他于二十年代先后创作的《恶魔纪》（*Дьяволиада*，1924），《不祥的蛋》（*Роковые яйца*，1924）和《狗心》（*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1925）体现了对“科学乌托邦”的讽刺。在他的这一系列莫斯科小说中，莫斯科是在一座被异化的都市，体现出深刻的反乌托邦性。然而在国家乌托邦主义空前盛行的年代，他也因作品对反乌托邦性的揭示使他失去了继续发表作品的权利。在经受了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之后，1940 年，他在贫困中死去。在他所有剧目遭禁的十几年间，他仍在痛苦和孤独中坚持不懈地创作。最后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浓缩了布尔加科夫这段痛苦的心路历程，解构了莫斯科上空的国家乌托邦光环，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表现了布尔加科夫在现代性思想付诸实践时产生的负面效果的失望和愤怒。与此同时，小说又在莫斯科上空构建起了一个理想之地表达了对乌托邦精神的不懈渴求。

二、《大师与玛格丽特》中莫斯科的异化

《大师与玛格丽特》从反乌托邦叙事的角度描绘了莫斯科中的种种景象，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揭示和批判，也寄寓着对人性和自由回归的深切期望，这一理想在莫斯科时空中体现得尤为鲜明。由于“莫斯科——俄罗斯的心脏”的独特地位（Федотов，1992，p.56），莫斯科被赋予了承载神圣恩典的象征意涵，这使它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具有超越现实的意义。布尔加科夫不仅探索了无神论时代俄罗斯的精神境遇，也借由莫斯科中的异化景象反思将现代性方案无节制地加以使用造成的负面效果，重新诠释了首都莫斯科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故事背景设定于 20 世纪三十年代的莫斯科，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构成了其社会的核心语境与基本社会景观。这时的莫斯科已经不再是以往俄罗斯文学中舒适温暖的“永恒之城”，而是变成了一个异化都市。在积极向上的表象之下，人心变得冷漠自私，毫无信仰。这座城市在传统宗教价值观经历“祛魅”之后，精神领域呈现出一种显著的真空状态。尽管一种以科学主义与历史进步论为内核的世俗信仰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但这种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新信仰，却无法回应个体关切的价值命题与生命意义问题。

¹С.Борис,Расшифрованный Булгаков. Тайны Мастера и Маргариты.М.:Яуза, Эксмо,2006.с.9.

小说用公寓、精神病院、地下室等不同的空间划分出了不同的层级，构建了一套空间编码系统，“通过空间层级的价值编码与能源分配的物质规训”（杨康，2025，p.57），将不服从秩序的个体驱逐至边缘，完成对主体的客体化与等级化规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把权力阶层所规划与主导的空间形态定义为“表象空间”（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列斐伏尔，2021，p.51）强调表象空间是权力和资本的工具，它在强调效率、功能和控制的同时，也压抑了人的身体、情感和欲望。空间作为意识形态乌托邦的管制工具，试图将每一位公民纳入其所预设的科学与理性框架之中，并以一种高度秩序化的规训着人民的行为和精神。居民楼和疯人院等建筑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空间缩影。它们排列严整、编号明晰、管理有序，构成了一座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式的现代都市景观。（福柯，2003，p.224）这种建筑布局与空间组织，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居住容器，更成为一种隐形的权力技术，持续地对居民进行着可见而不可确知的监视与规训。里面所居住的人们身为公民，行为举止都要合理恰当，在精神上要相信无神论。人们的言行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就会被遭到治疗。小说中斯特拉文斯基医生即为此种理性权威的化身。他并非酷吏，言语平静甚至淡漠，他的诊断和注射、温水浴等治疗方法都显得温和与理智。他以冷静专业的姿态，通过“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及一系列医学化处置，将伊万对真相的追寻重构为病理症状。在此过程中，精神病学作为福柯所指的“权力-知识”复合体（同上，p.253），为体制压迫提供了科学合法性。这种控制技术不再依赖暴力惩戒，而是通过医学话语对个体经验进行系统性解构与再编码，最终目标在于将越轨者改造为符合系统规范的正常人。伊万在这样的治疗下产生了自我怀疑正是他被成功规训的标志。他被关押进精神病院这一“全景敞视建筑”之中，从一开始的反抗到产生自我怀疑，标志着权力通过科学话语实现了精神规训。最终伊万出院，成为一个看起来被治愈了的、无害的人。由此社会完成了自我净化，维护了官方乌托邦叙事的完整性和纯洁性。

这种粗暴的现代性方案所造就的民主社会最终形成了暴力和独裁的官僚统治，官僚统治中人的异化程度逐渐加深。科学和理性没有帮助人们走向进步，反而早就了非人化（обесчеловечивание）的世界。在现代性乌托邦方案中，标榜科学、理性和进步的现代性宏大叙事逐渐沦为了政治统治的工具。莫文协主席柏辽兹所掌管的“鲍里格耶陀夫之家”是苏联知识分子、官员和艺术家建造的集体住宅。其中聚集的“马索利特”会员们，以其镶金边的会员证闻名全城——那是一种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身份象征。他们在此享用奢华餐厅，养得肥头大耳，生活悠闲自在，甚至借国家名义收受贿赂，中饱私囊，他们正是社会风气的代言人。布尔加科夫毫不留情地讽刺他们是“精明鬼、墙头草、马屁精”，（布尔加科夫，2024，p.91）并借书中人之口直斥：“他们最近太不像话，好吃懒做，酗酒无度，借用职权乱搞女人，什么都不干，再说也什么都干不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职务一窍不通。就知道蒙骗上级！”（同上，p.95）他们中的一些人，写着嘹亮的诗歌，其作品已经被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乌托邦话语所笼罩，盖过了活生生的人。他们嘴上假装关心他人的生活，实际上却对人们的命运毫不在意，毫无同情。在听闻柏辽兹的死讯之后，他们转头就可以继续投入舞池忘情地狂欢。他们毫不在意他人，只关心自己能不能继续享乐。因此，当伊万告诉他们杀死柏辽兹的真凶时，他们也只会认为伊万是受了刺激而发狂，不会有人想要去查明那个毫无意义的真相。他们作品中唱的那些空洞的幻想，早与现实中人民的生活相差甚远。在嘹亮的高歌背后隐藏的虚伪与冷漠，象征着现代莫斯科传统道德精神的消逝，也意味着物质利益使人变得非人化，个体逐渐沦为被动让渡自我的存在。

虽然国家乌托邦的实行使得社会保持了表面的平静，但是这种通过监控、谎言和暴力，持续地对人民的精神世界施加压力，使莫斯科的居民表现出普遍的麻木倦怠和道德的冷漠。面对柏辽兹的离奇死亡、剧院里的魔幻事件，人们迅速接受官方解释，选择不去深究。在一个随时可能被逮捕的环境里，对异常现象保持麻木，这是一种生存策略。在如此高压的莫斯科城市图景中，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虚空成为了更严重的问题。小说中莫斯科去宗教化政策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信仰的沙漠，里面居住的居民大多不再有任何信仰和敬畏，诗人伊万·无家汉在开篇时也是这个体系中的一员。作为著名杂志社的编辑，柏辽兹要求伊万写一首反宗教的诗歌，伊万在诗歌中需要根据要求对耶稣“极尽抹黑之能事”（布尔加科夫，2024，p.5）。当柏辽兹和沃兰德就有无耶稣这件事情进行了讨论时，前者坚称“我们不信上帝”，并宣称在莫斯科和国内，人们现在信仰的是理性与科学。但是，“以无求与外的人本主义为基础的现代道德秩序存在着不稳定性，而超验性缺席的社会在满足人们灵性渴望时常常存在问题。”（俞航，2021，p.161）工具理性的悲剧正体现于此，它可以服务于任何目的，包括那些毁灭性的目的。历史上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暴行已经证明了，“单单工具理性的规则”如何将那些美好的乌托邦理想变为排他的根源，因为“在那些规则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社会工程’采取的大屠杀式的手段视为不适当”。（鲍曼，2011，p.24）当个体的道德责任被分工稀释，他的内在道德评价就会被程序正当取代，导致道德的冷漠。小说中的作家们仅仅把写作当作一份工作，成为意识形态的传话筒；莫加雷奇为了住进大师的房子而写了一封告密信诬告大师；剧场中人们为了争抢金钱推搡厮打。人们聚焦于眼前的利益，难以察觉在思想遥不可及的深处，道德和信仰的悄然消逝。二十世纪初著名的宗教哲学家沙霍夫斯基（Шаховской）在其《与俄罗斯人民的对话》（Беседы с русским народом）中指出：“人类在技术和社会方面取得进步的同时，却未能在增进善良、光明和精神智慧方面取得同等热忱的进步。”（Шаховской，1998，p.96）布尔加科夫有力地证明了当代人总体上与过去的人并无二致，且对于前者而言，工具理性成为了意识形态统治工具，反而阻碍了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发展。

布尔加科夫通过对莫斯科城市和人心的揭露，对当时社会所推崇的乌托邦理想进行了深刻的祛魅。与此同时，作者通过一场大火焚烧尽莫斯科的一切，表达了重建伦理道德体系的理想。小说结尾大火烧毁了大师的地下室，也焚烧尽了他在莫斯科受到的种种痛苦，这象征着魔幻力量对污浊现实的彻底清扫，是从此岸过渡到彼岸所必须经历的“通过仪式”。大火的焚毁象征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在决裂后的废墟上，开启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可能。

三、莫斯科文本的救赎维度：永恒的家園

布尔加科夫并未止步于解构，而是通过笔下的核心人物，积极探索人在扭曲城市空间中的生存姿态与精神出路，从而在莫斯科文本的谱系中，完成了一次对心灵自由的回归与城市精神内核的再造。作为布尔加科夫莫斯科小说的最后一部，《大师与玛格丽特》体现出一个怀揣俄罗斯灵魂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负有的强烈责任感。

小说的最后，大师与玛格丽特选择彻底离开莫斯科进入“永恒的家園”，这正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复归。大师在莫斯科所经历的种种精神磨难，实则成为他完成内在漫游、实现主体觉醒的必经之

路。通过阿扎泽勒所递上的毒酒，大师与玛格丽以肉身的死亡换取了灵魂的彻底自由，从而进入一个被称为“永恒的家園”的超越性境界。这里的“永恒的家園”是一个调和尘世与彼岸、历史与永恒、个性与救赎的所在。它以其绝对的宁静与自由，与现实中的莫斯科构成参照。可被视作历代知识分子对真理与自由不懈追求的理想投射与空间化象征。

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三大世界（古老的耶路撒冷、现代的莫斯科和沃兰德的异界）构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结构，呼应了哲学家弗洛连斯基（П.А.Флоренский）的“三位一体”（Троица）哲学。弗洛连斯基在《真理的柱石与确证》（*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1914）中指出，“真理的主体是三个位格的关系。”（Флоренский, 1914, p.49）三个位格都是真理的不同侧面，且“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第三个来调和。”（同上, p.50）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精神对象的表现，“本质在现象中具有可具体表现性”，“这个表现的中介就是象征”（徐凤林, 2006, p.173），以象征为中介可以连接两个世界。一个是感性现实，是物理现实；另一个是与此相符的意义和本质。两者融合成为象征，象征集自然之物和精神之物于一体。“凯撒王国”莫斯科和“精神王国”耶路撒冷通过“永恒的家園”连接，“永恒的家園”正是本质世界于现象世界中的象征。“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最后避难所虽如尘世般舒适，却显然属于永恒——位于天地交界处，真实与虚幻空间相接的平面之上。”（Борис, 2006, p.497）它并非脱离现实的幻境，而是残酷的莫斯科和永恒的光明之间的中介和象征，它见证了三界的同一，是真理的显形。

三者之间的同一并不是静态的同一，而是动态的生成过程，“在另一位的身上，通过自我贬抑，我的存在方式从罪恶的自我主张的势力下找到‘救赎’，从希腊思想家所言的孤立存在的罪恶中解放。在第三者中，这个得到救赎的形象被‘荣耀化’，确立了不朽的价值。”（Флоренский, 1914, p.92）在莫斯科的现实世界中，大师的性格是懦弱、恐惧、被社会抛弃的，所以伴随着雷雨，沃兰德用毒药终结了大师的尘世生命，这一举动完成了大师人格的萃取，将其本质从尘世的奴役中彻底剥离出来，灵魂才能前往“永恒的家園”。准备前往“永恒的家園”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决定最后去见一面疯人院中的伊万，伊万告诉大师从今往后想写一篇关于彼拉多故事的续集。这一雷雨时刻是三界交叠的时刻，人物在与精神体验中实现精神的安宁。这一“永恒的家園”成为了艺术、真爱与宽恕的终极归宿，让不同的人物都确立了其永恒的价值。

布尔加科夫并未宣判莫斯科的彻底沉沦，而是在其僵化的规训空间内部，巧妙地撕开了一道裂隙，构筑了一处可供精神喘息的空间。在大师和玛格丽特走后，莫斯科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所有超自然事件都被赋予一套合乎逻辑却荒诞不经的官方解释。魔术表演的混乱被归咎于“集体催眠术”；格里鲍耶陀夫之家的大火是因为烟囱通风不畅；任何试图讲述真相的人都会被斥为疯子。然而，伊万·无家汉的存在，构成了对这一普遍遗忘的反抗。伊万并未选择逃离莫斯科，而是经历了一场内在觉醒。他从一个编写官方反宗教诗歌的符号化文人，在大师的精神启迪之下，逐渐复苏独立思考的能力，蜕变为承载记忆与真理的历史学者。每逢月圆之夜，他不再焦虑困顿，因为他步入了梦境中的“月光之路”，与彼拉多和大师相遇，在精神漫游中获取内心的安宁。这一梦境时刻，是古代耶路撒冷、现代莫斯科现代与沃兰德的异界之间的壁垒被短暂打破的时刻，是伊万获得永恒安宁的时刻，也是属于伊万的永恒家園。

值得注意的是，“永恒的家园”是由沃兰德提供给大师的。象征光明的利未·马太并未接纳大师进入光明，而是认为：“他不配得到光明，他只配得到安宁。”（布尔加科夫，2024，p.404）作为邪恶化身的沃兰德却被大师和玛格丽特打动，所以拯救了他们。小说中沃兰德和利未·马太形成了对抗：马太不承认作为邪恶化身的沃兰德的存在，后者则用“影本来自物和人”来进行反驳（同上，p.402），揭示出利未·马太的善必须在和沃兰德的恶的对比中才有意义。“善与恶是永恒而无法割裂的生活矛盾，沃兰德就是这一矛盾的化身”（梁坤，2016，p.237）。基督教文化和斯拉夫民族文化的滋养，使布尔加科夫形成了善恶并立的认知；恶的存在也时刻激励着人们向至善走近。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恶的经验使人朝向另一个世界，唤起对这个世界的的不满”（Бердяев，1994，pp.111-112），世界上存在恶，证明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并昭示着还存在着一个比现存世界更好的世界的可能。

对于承载着布尔加科夫反乌托邦精神的莫斯科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现实生活中莫斯科的压迫，那么大师通往的那个“永恒的家园”就毫无意义。反乌托邦的“反”既是相反和反对，也是返归和复归。反乌托邦和乌托邦一直如影随形，反乌托邦的存在推动着乌托邦的发展，它在揭示乌托邦构想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合理之处的同时，也在尝试把乌托邦思想从极权主义中拯救出来，拯救着乌托邦思想本身的美好希望。《大师与玛格丽特》不仅是反乌托邦的实验，更是一次对城市精神重绘。布尔加科夫在莫斯科上空构筑的那个“永恒的家园”，既是反乌托邦精神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也是对乌托邦本源的复归，揭示了人们对美好世界的梦想。它提醒我们，即使在一片看似封闭的土地上，心灵仍能通过“三”的法则，穿越时空的壁垒，在闪电交织的瞬间，触达自由与完整的永恒。

结语

小说的最后玛格丽特与大师去往的“永恒的家园”体现了布尔加科夫对未来的世界的希望，他以作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写出了时代的病症，捍卫着俄罗斯文学宝贵的精神资源。大师在魔王沃兰德与忠贞的玛格丽特的帮助下，逃离这个尘世，去往一个“永恒的家园”。这个家园能带给大师内心的宁静和永恒的心灵自由。大师的经历正如布尔加科夫人生经历的“镜子”。他们都身为作家，都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孤军奋战。官方的批判让他们痛苦万分，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内心的召唤和使命感却让他们心甘情愿写下这篇小说，在苦难过后把最真挚的情感和精神献给人民。促使他们写作的，是一种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弥塞亚”精神——使命感，这也是布尔加科夫对传统俄罗斯精神回归的信号。他肩负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必然使命，探寻人类走出痛苦困境之路，摸索构筑幸福生活的存在模式。此种理想虽如《大师与玛格丽特》结局中所呈现的那般缥缈遥远，但它依然构筑起一个具有深厚乌托邦意涵的精神性栖居之所。此类空间虽往往诞生于现实之“恶”、混乱或压迫之中，却最终借助爱与心灵的力量，实现对现实苦难的救赎。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新文科视域下外国文学史课程与区域国别融合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2025JGA13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陀思妥耶夫斯基现代性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1FWWB01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Wu Peisha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6544-3334>

Yu Ha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6-6378-9581>

References

齐格蒙·鲍曼（2011）：《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

[Bauman, Zygmunt (2011).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translated by Yang Yudong, Shi Jianhua. Yilin Press.]

Н.А. Бердяев (1994).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ы духа*. Республика.

[Berdyayev, Nikolai (1994). *Philosophy of the Free Spirit*. Respublika Publishing House]

尼·别尔嘉耶夫（2000）：《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周靖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Berdyayev, Nikolai (2000). *The Realm of Spirit and the Realm of Caesar*, translated by An Qian, Zhou Jingbo.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尼·别尔嘉耶夫（2002）：《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学林出版社。

[Berdyayev, Nikolai (2002). *The Meaning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Zhang Yaping. Xuelin Publishing House]

尼·别尔嘉耶夫（2014）：《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

[Berdyayev, Nikolai (2014). *The Fate of Russia*, translated by Wang Jianzhao. Yilin Press.]

尼·别尔嘉耶夫（2024）：《俄罗斯理念：19世纪和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张百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Berdyayev, Nikolai (2024). *The Russian Idea: The Main Problems of Russian Thought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Zhang Baichu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马歇尔·伯曼（200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

[Berman, Marshall (2003).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Xu Dajian, Zhang Ji. The Commercial Press.]

布尔加科夫（2024）：《大师和玛格丽特》，李春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Bulgakov, Mikhail (2024). *The Master and Margarita*, translated by Li Chunyu.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董晓（2010）：《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对峙与嬗变：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花城出版社。

[Dong Xiao (2010). *Utopia and Anti-Utopia: Confrontation and Evolution –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viet Literature*.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Г.П.Федотов (1992). *Судьба и грехи России.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София.

[Fedotov, G.P. (1992). *The Fate and Sins of Russia: Selected Articl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Sofia.]

П.А.Флоренский (1914). *Столп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истины: Опыт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теодицеи в двенадцати письмах*. Путь.

[Florensky, Pavel (1914). *The Pillar and Ground of the Truth: An Essay in Orthodox Theodicy in Twelve Letters*. Put Publishing House.]

米歇尔·福柯（2003）：《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Foucault, Michel (2003).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Yang Yuany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傅星寰（2022）：《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Fu Xinghuan (2022). A Study of “Moscow Text” and “Petersburg Text” in Russian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乔·奥·赫茨勒（1990）：《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译。商务印书馆。

[Hertzler, J.O. (1990). 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 translated by Zhang Zhaolin. The Commercial Press.]

胡颖（2022）：“‘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的古罗斯文学线索”，《中国俄语教学》（03）：76-85。

[Hu Ying (2022). “The ‘Moscow, Third Rome’ Doctrine in the Ancient Russian Literature”. Teaching Russian in China (03): 76-85. DOI: <https://doi.org/10.21638/spbu19.2023.205>]

拉塞尔·雅各比（2007）：《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彬译。新星出版社。

[Jacoby, Russell (2007). 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Utopian Age, translated by Yao Jianbin. New Star Press.]

姜磊（2020）：《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谱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Jiang Lei (2020). A Study of the Intellectual Genealogy of “Modern Intelligentsia” in New Russian Literatur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姜文振、黎新华（2020）：《梦魇与守望：西方反乌托邦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Jiang Wenzhen, Li Xinhua (2020). Nightmare and Vigil: A Study of Western Dystopian Fic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亨利·列斐伏尔（2021）：《空间的生产》，刘怀玉译。商务印书馆。

[Lefebvre, Henri (202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Liu Huaiyu. The Commercial Press.]

梁坤（2016）：《布尔加科夫小说神话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Liang Kun (2016). A Study of Mythological Poetics in Bulgakov's Novel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Иоанн, Шаховской (1998). Беседы с русским народом. Лодья.

[Shakhovskoy, Ioann (1998). Conversations with the Russian People. Lodya Publishing House.]

Борис.Соколов (2006). Расшифрованный Булгаков. Тайны «Мастера и Маргариты». Яуза.

[Sokolov, Boris (2006). Decoded Bulgakov: Secrets of “The Master and Margarita”. Yauza Publishing House.]

徐凤林（2006）：《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Xu Fenglin (2006). Russian Religious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杨康（2025）：“人工智能的商品化：《克拉拉与太阳》中技术资本主义的伦理殖民”，《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01）：56-64。

[Yang Kang (2025). “The Commodif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Ethical Colonization of Technocapitalism in Klara and the Sun”.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01): 56-64.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1.07>]

俞航（2021）：“以‘更微妙的语言’守护超验性——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书写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基督教文化学刊》（45）：158-177。

[Yu Hang (2021). “Safeguarding Transcendence with ‘A Subtler Language’: Dostoevsky in Charles Taylor's Account on Modernit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45): 158-177.]